

西方三报涉华国际舆情研究 (1992—2010年)(上)

郭 可

(上海外国语大学 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 上海 200083)

【摘要】 本论文研究了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德国的《时代》周报(Die Zeit)和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三份报纸中国报道的涉华舆情, 来探讨研究涉华国际舆情近20年来的发展特点、变化规律和趋势。研究发现: 西方三报的涉华国际舆情尽管还保留其固有的成见, 但也在不断变化之中, 而且这种变化不仅与中国社会本身的发展有关联, 而且与这些国家自身的社会发展也有关联。本报告还发现: (1) 西方三报涉华国际舆情态度在总体上以中性态度为主, 尤其是《纽约时报》这种趋势分布很明显。中性主题主要包括文化艺术、台湾、灾难、经济、娱乐体育等。西方三报对海外华人、利益集团、其他外国组织、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和海外中国企业等也基本持中性态度。(2) 西方三报对民主人权主题以及不同政见者、党员、提及“六四”事件等意识形态有关的报道时, 其倾向性态度总是很负面的。这说明西方三报对中国和中国社会的固化成见是较难改变的, 尽管中国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3) 引用在中国国内的外国人为消息源的报道态度最为负面; 同时在将中国与其他国家并提的报道中, 特别是美日德俄的报道中, 负面态度的比例超过30%。

【关键词】 美德法媒体; 新闻报道; 涉华国际舆情

【中图分类号】 G212

【文献标识码】 A

第一节、国际舆情与中国社会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 中国社会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国际图景发生了巨大变化。2010年我国经济总量(GDP)超越日本, 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1] 我国与世界的关联程度越来越紧密, 作为一个发展中大国不断参与到国际事务中来, 不仅加入了世贸组织, 还成功举办了奥运会和世博会; 我国不仅开始跨国企业并购, 还积极参加联合国维和部队; 不仅把航天员多次送入太空, 还建造了航空母舰, 以及开展了深海探测活动, 国际社会对中国的关注度不断增加。可见, 21世纪以来, 中国的总体国力和国际影响力得到了提升, 已步入一个历史上前所未有的盛世时期。

中国在盛世时期的发展必然给以西方国家为主导的现有国际秩序和传统势力范围带来影响甚至冲击。这必然引起这些国家(尤其是西方国家)的不快, 因而容易出现各种误判、矛盾、摩擦、争端和冲突。涉及的领域不仅包括传统意义上的人权、民主、自由和意识形态, 还涉及到政治、外交、经济贸易、国家安全、军事活动和领土纷争等各个方面; 涉及的国家不仅包括西方国家, 还包括其他国家, 如近来与我国在南海问题有冲突的菲律宾和越南。

从目前的情况看, 中国与这些西方国家和其他国家的误解、矛盾和争端具有和多变性, 因而

【作者简介】 郭可, 上海外国语大学新闻学院教授、院长、国际关系博士点博导、上外中国国际舆情研究中心主任

【基金项目】 本报告是作者社科基金项目“国际舆情分析和中国对外宣传战略研究”的组成部分, 编号为06BXW011; 该项目受到了本人主持的2006年社科基金和上外一流学科建设项目的资助。

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这也决定了中国在今后较长一段发展时期和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多变国际环境具有长期性，因此有必要持续关注研究我国发展过程中的国际环境变化。

在全球信息化时代，全球媒体在多变国际环境形成过程中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大。事实上，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全球媒体在打造涉华国际舆情平台过程中总是能扮演极为重要的舆情导向作用。它们不仅传播即已发生的事件和意见，同时也在塑造观点，形成各种国际间意见场或舆情场，影响国际公众、国际机构和民族国家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方式。因此，把握好这些主流全球媒体的国际舆情走向对中国政府、公司、机构等做出正确决策或营造有利于我们的国际环境显得至关重要。

由于对国际舆情处理不当，我国遭受重大损失的例子还是不少。可以说，进入新世纪以来，我们几乎每年都在吃国际舆情的亏，有些是政治层面的，而有些是经济层面的。如2003年的“非典”事件中，由于起初政府部门隐瞒SARS疫情并封锁病情信息，最终外国媒体曝光后导致中国在国际舆情中较大的被动局面。再如2005年中海油收购美国尤尼科石油公司失败事件也是国际舆情的典型案例。中海油处于商业方面的考量决定收购美国尤尼科公司，但美国媒体从“中国崛起挑战世界能源配置”和“收购威胁美国国家能源安全”等方面对此事件进行炒作，在美国引起舆情的轩然大波。^[2]

当今媒体信息时代，国际舆情一般是通过全球媒体新闻报道来体现的。这一点对于中国目前所面临的多变国际环境而言显得尤为重要。一方面，中国迫切需要在国际上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因为中国社会发展需要一个和谐和平的国际环境；此外，由于意识形态、文化价值观的差异，西方媒体主导的国际舆情格局对中国的定位并不友好，有时甚至是有敌意的。这种不友好或敌意主要体现在国际环境对中国的负面影响，或者说是西方主导的国际媒体中形成的诸多对中国不利的涉华国际舆情；最后，西方在塑造国际舆情的主导权以及中国回应外部攻击时的被动局面是属于软实力的范畴，因此西方这种的软实力优势和中国相对劣势将持续较长的历史时期，不可能在短期内改变。近年来，中国和平发展道路经常受到国际舆情的干扰，并开始波及中国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个领域，影响方式趋向多样化和复杂化。

因此，研究国际舆情是中国目前的大国国际地位决定的。中国要树立一个负责任的大国形象，必须为自己营造有利的国际舆情。可以说，目前中国比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需要认真分析和研究国际舆情，这样才能应对不断变化的国际舆情，为中国国家利益服务。

一、国际媒体与国际舆情

本报告中，国际媒体主要是指那些从事国际信息传播活动的主体或传播媒体，它可以是私营或国营的（目前主要以私营为主），也可以是一个媒体或一个媒体集团（如贝塔斯曼）；可以是以新闻性信息为主的媒体（如报纸、电视、通讯社等），也可以是以非新闻性为主的媒体（如影视媒体集团）。一般具备三个特征：（1）国际媒体的信息传播活动具有跨国性；（2）国际媒体信息传播的经营活动具有跨国性；（3）国际媒体的影响力具有国际性。^[3]

国际媒体从一开始就与国际政治和外交事务或其他国际社会的关注焦点密不可分。在信息全球化时代，国际媒体实际上已逐渐成为国际社会的自然延伸部分，因为：（1）国际媒体能够及时报道国际社会内发生的重要事件。这些事件可以是大国之间以及大国与小国之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交往活动，也可以是发生在世界各个角落的冲突和战争等；（2）国际媒体已经成为报道国际事件的权威，使它们可以有意或无意地适度放大或者缩小这些国际事件的重要性，有时甚至不会受到国际受众的质疑；（3）国际媒体在确立其报道权威之后便能形成一定的国际舆情场，并可能影响国际舆情客体（即相关国际事件）的变化，这种变化经常被视为国际媒体的影响力。

虽然国际媒体对国际事件的影响力不是直接发生作用，有时甚至是无形的，但研究表明国际媒体对国际社会和国际事件的影响力是存在的，通常是用国际舆情的方式来表现。正因如此，世界各国都十分重视通过国际媒体阐释和宣传本国的外交政策和活动，重视利用国际媒体为本国国家利益服务，塑造和维护良好的国家形象。

但是由于世界各国的媒体发展水平并不平衡,西方国家在国际媒体界占有优势,而其他国家则无法主导国际媒体界。因此,国际媒体强势国家(主要是西方国家)与弱势国家之间的互动关系也就有可能演变为一种影响和被影响的关系或者甚至是一个主动和被动的关系。多数国家不但通过国际媒体来沟通,而且也通过国际媒体来实施相互间的影响力或形成国际舆情场。

国际舆情场一旦形成,不仅可成为国际社会人群的行动指导,而且对另他国际社会人群也会形成一种影响力或者压力,会形成上文中提及的五个方面的作用。制造或者引导国际舆情是国际媒体一项非常重要的功能,一方面,国际媒体所传递的新闻信息和所宣传的价值观会直接影响国际舆情,另一方面在一些重大事件中,国际媒体可能就会充当国际舆情的制造者。这种由国际媒体所“制造”的国际舆情会极大影响到有关国家的决策、外交政策和国际形象。有时,国际媒体还能够为一些重大事件或者局部战争定性,影响到事件或者战争的“合法性”。

鉴于国际舆情这种不可忽视的影响力,在国际传播中,各国都尽力左右国际舆情。例如在1979年11月的美国和伊朗的人质危机中,美国和伊朗都试图用国际媒介为自己的行动贴上合适的标签。美国的官方人质被伊朗当局叫做“间谍”。最后大多数国际媒体(特别是强有力的西方媒体)都站到了美国一边。海湾战争期间,西方联盟把伊拉克行为定性为“萨达姆与整个国际社会的对抗”,并通过国际媒体使这一定性变得“合法化”。美国通过国际媒体的宣扬和渲染,得到了大多数国家的支持并出兵伊拉克。

最典型的例子是1999年发生的科索沃战争,北约绕过联合国悍然出兵入侵南斯拉夫。当时的国际舆情都倒向西方国家,给这次战争披上了“正义的外衣”。作为在当今世界有着重大影响国际电视媒体CNN和BBC都充当了战争的“宣传机器”,几乎可以说是在为虎作伥。在科索沃战争中,北约通过从时间上控制传媒、充分使用现代化的视觉传播手段影响媒体、向媒体提供无法证实的甚至虚假信息来引导国际舆情走向等诸多手段来操纵媒体。他明确指出CNN和BBC误导了公众。^[4]国的印刷媒体也是如此,也是清一色对塞尔维亚族的“妖魔化”宣传,其中“震耳欲聋的沉默”便是塞尔维亚族的声音。据塞族团体统计,《洛杉矶时报》有关科索沃战争新闻报道数以千计,无一出自塞族作者。一名在美国南方名牌大学任历史系主任的著名塞尔维亚族学者向《纽约时报》的十多篇投稿,全部石沉大海。^[5]在西方主导的国际媒体和话语体系中,北约对南斯拉夫发动的这场战争就显得“合情合理”。

当今世界,国际媒体的一个重要特点是基本由西方国家占主导地位。因此在国际传播领域,发达国家占尽优势,发展中国家往往显得非常被动。近年来一些西方媒体散布的“中国威胁论”,中国如何“偷窃美国的核机密”等等事例都与一些主要国际媒体炒作国际舆情有关。

正因如此,当今国际舆情基本也是由西方国家(尤其是美国)主流媒体占主导,并按照它们的价值观和利益来制造国际舆情。西方国家不仅垄断着主要国际媒体,而且还主导着大部分信息传播内容与流向,因为西方发达国家的传媒业无论在数量、覆盖面、信息量还是社会影响力等方面均居主导地位。

二、国际舆情的概念和特征^[6]

随着信息化和全球化时代的到来,世界各国发展的相互依赖性日益明显,各国对其国家的信誉度或者国家形象的关注程度也日益提高,因此国际舆情的作用在过去30年中显得越来越重要。

国际舆情作为一只“无形之手”,对于一个民族国家、机构和个人而言,既可以作为一种推动力量,也可以作为一种反对力量。每一个具有一定信誉度的民族国家都希望利用国际舆情来实现其预定的目标,尽量减少负面影响。

现代社会中,国际媒体与国际舆情之间已建立起一种天然的、密切的关系。国际媒体凭借其国际新闻报道特性,不时介入国际舆情的产生和作用的各个环节中。这种介入构成了国际舆情的千丝万缕关联。归纳起来,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反映并代表舆情、引发舆情和引导舆情。^[7]

对于媒体反映并代表舆情,李普曼在其经典的《舆情学》中指出,新闻传播系统(主要指报刊)通过新闻传播活动,扩大了受众对世界的认知。随着受众对社会事实了解越来越多,他们也

更倾向于表达对这些事件的看法或者是意见。此时，媒体的作用就不仅仅是传播信息，同时还承载着受众对这些信息的意见和态度，即舆情。这时，舆情不只是表现为直接的新闻评论，而且可以存在于对事件的客观报道中。两者的区别是“一种是直接式表达，一种是间接式表达；一种是有形的表达，一种是无形的表达”。^[8]他认为报刊就像探照灯的光束一样，不停地照来照去，把一件又一件事从黑暗处带到人们的视域内”。^[9]国际媒体和国际新闻不可能反映所有发生过的事实，只能选择其中的一些并运用一定的观点来报道，也就是说国际舆情是带有一定倾向性和态度的。

科恩从依附角度也分析了媒体与舆情结合的必然。由于缺乏每天与外界的联系，缺乏任何测量受众对于外交政策发展反映的度量，政策制定者就把媒体作为反映舆情的一项重要指标，就像是反馈。因此很多人把媒体和舆情视为一对近义词，在使用时经常会将两者等同或交替使用。^[10]这种解读显然也可以延伸到国际舆情。

因此，本报告中所指的国际舆情是指民族国家（包括该国全球媒体和公众）在国际公共空间对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和对象（包括民众、机构、国家等）所形成的态度和意见的总和。^[11]

国际舆情有着一般舆情相同的特征：（1）倾向性：舆情是人对于舆情客体的评价、看法和态度，但凡舆情中形成的看法一般都具有鲜明的倾向性（支持、反对、褒扬或批评）；（2）集合性：舆情不是个人的意见，而是集体的意见和态度的表达。个人的意见可以强烈，但只有当其意见得到某一群体的认同时才能被称为舆情；（3）表层性：舆情的形成并非深刻的讨论或深思熟虑的选择，而是缺乏理性、系统性和科学性的，它更重视情绪、偶然性及数量对比。^[12]但是由于国际舆情的主体、存在空间、政治性以及功能上的特殊性，国际舆情有其很多的独特性。

本报告认为，当前国际舆情与国内舆情的区别主要表现为四个方面：

（1）主体不同：国际舆情主体主要是存在于国际空间的民族国家、国际性组织和机构或个体。而国内舆情的主体更多是某一个国家内的话题或对象。由于关注主体的不同，国际舆情和国内舆情的关注点、呈现方式和发生周期都会有所不同。当然，在一个信息相对开放的社会环境中，国际舆情和国内舆情的主体、关注焦点和呈现方式等也会交叉和重叠，有时也会出现国际舆情和国内舆情互动的现象。像2012年中国成功将发射天宫一号并与神九交会这样的事件不仅是国内舆情关注的焦点，也是国际舆情关注的内容，尽管关注的方式、背景以及动机会不同。

（2）存在空间的不同和多样性：国内舆情的存在空间主要是在一个民族国家内部，而国际舆情的存在空间主要是在各个民族国家之间的一种有效交流空间，也就是国际公共空间。存在空间的不同也决定了国际舆情和国内舆情所发挥的作用和影响力会有所不同。国内舆情的作用主要会在一个民族国家的内部，其影响力也主要限于一个国家内部；而国际舆情的作用则主要发生在民族国家之间，其影响力可以是二个国家之间，也可以是多个国家之间。正因为这种存在空间的不同，国际舆情和国内舆情也表现出了不同的多样性和复杂性。

（3）政治特性凸现：国际舆情与国内舆情最大区别可能在于其政治性。由于国际舆情的主体主要是外国政府、国际性组织和机构以及国际人士（一般为国际意见领袖），它更侧重各大主体的决策过程中所产生的影响，具有较强的政治性，尽管其内容可以涉及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其表现方式主要是来自外国的外交压力，对强国的批评，也可以是一些对国际形势产生影响的政治趋向。而国内舆情由于主要是一个国家内部的舆情场，它可能具有较高的政治性，但在大部分情况下可能是非政治性的话题和内容。

（4）信誉度问题以及官民关系。国际舆情中，每一个主体（即民族国家）对国际舆情的敏感程度，或者说国际舆情对每一个民族国家决策的影响大小，主要看这一民族国家对其信誉（主要指国家形象）的重视程度。而一个民族国家对其信誉（国家形象）的重视程度取决于四个方面：一是这个国家在世界体系中所占的地位（或实力），是强国还是弱国等；二是与其他国家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是联盟国家，还是互利的合作关系，是竞争关系甚至敌对关系；三是领导层决策风格和战略趋向，是倾向于国际合作，重视外交活动还是相对保守甚至是好战的态度；四是一

个国家的国内形势，是封闭还是开放的社会以及其开放程度如何等。^[13]相比之下，国内舆情则主要侧重一个国家内部的官民关系：即政府与老百姓之间的关系以及一个社会内部的民生问题，是一个国家的内部事务。

此外，国际舆情（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是否等于世界舆情（world public opinion）？中外学者对此看法不完全一致。中国学者一般认为国际舆情和世界舆情是两个通用的概念，而且倾向于认为国际舆情主要就是指外国媒体上的新闻报道和反映的言论，而不是指世界范围内的舆情（主要是指国际民意和民情），因为在世界范围内调查国际受众对于某一舆情客体的舆情，是相当困难的，能够把握一个国家内的舆情就很不容易了。^[14]

而有些西方学者则对国际舆情和世界舆情进行了区分，认为世界舆情主要是指世界范围内人类所共有的价值观或基本意见，如人们向往和平、摆脱贫困等愿望，其主体主要是世界上各民族国家的抽象概念，一般不涉及到政治、军事和经济等硬实力影响，因此它是软性的、脆弱的，一般不会被视作一股真正的力量，^[15]最多是共同价值观导向。但国际舆情则是指一种意见和态度的总和，一般表现为一种直接舆情压力，如在外交、经济和军事等方面。例如当其他国家批评某一个国家的政策时，这样的批评往往会被认为是一种国际舆情，会对被批评的国家形成舆情压力，有时会迫使其做出妥协的行为。

本报告认为上述对国际舆情和世界舆情的区分有合理之处：国际舆情主要是指国际媒体通过新闻报道内容对有一话题或对象所表达的意见和态度；而世界舆情（或者全球民意）则是指世界各国公众对某个话题或对象形成的总体态度。因此本报告认为国际舆情场的形式主要包括了全球媒体报道内容所反映的意见、态度以及和全球公众所形成的全球民意两种。

鉴于国际舆情主要是通过国际媒体的文本来表达并传播的，因此学术界对于国际舆情的研究主要是通过分析提炼国际媒体的文本来实现的。而对于全球民意则主要还是通过在全球范围内或具有代表性的国家内开展民意调查（发放问卷）来实现的。当然，如果资金充足，也可以就某一个涉及国际舆情话题既研究国际媒体文本的态度和意见，同时还可以开展民意调查，尽管这样的研究个案比较少。

当然，作为国际舆情的组成部分，全球民意除了作为一种全球价值观导向外，也可能在特定的条件下和环境形成强大的国际舆情场，产生很大国际影响力和舆情压力。尤其在互联网自媒体时代，国际舆情与全球民意的互动性在不断增强，有时还会形成相互影响的格局。但在多数情况下，国际舆情还是以全球媒体（包括新出现的自媒体）内容传播为基础的，尽管全球民意也会越来越参与其中，成为国际舆情场的有机组成部分。本报告主要研究的是基于全球性媒体新闻报道文本内容为基础的国际舆情。

第二节 研究目标和研究设计

一、研究目标

本报告的研究目标为：分析和探讨1992—2010年涉华国际舆情的总体趋势和特征。本报告研究了美国的《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德国的《时代》周报（Die Zeit）和法国的《世界报》（Le Monde）三份报纸中国际报道的涉华舆情，时间跨度为19年，着眼于西方媒体冷战后（1992年）至2010年对于中国的报道。

本报告希望通过对三个重要西方国家的主流报纸（美国的《纽约时报》、法国的《世界报》和德国的《时代》周报）^[16]过去19年间涉华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来研究涉华国际舆情近20年来的发展特点、变化规律和趋势。

1、关于研究时段说明

本报告的研究时段为1992年—2010年。这一选择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在国际关系层面，

1991年苏联解体标志着冷战结束,1992年则是后冷战时期的开端。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自1945年起统治世界政局的两级体制的崩溃,多级化和全球化成为世界政治经济的新趋势。因此,1992年这个划时代的年份是个合适的研究起点。其次,从中国国内形势来看,虽然在一般意义上,人们公认的新中国改革开放的起点是1978年底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但1992年邓小平发表了对中国改革开放至关重要的南巡讲话。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我们所有的改革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就是扫除发展生产力的障碍。”^[17]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邓小平同志的讲话坚定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国策,从此,中国经济开始实现真正启航。特别是中国在80年代就开始努力恢复关贸总协定缔约国地位,在1992年取得实质性进展。虽然在1992年全球已不是新事物,但这一年却是中国进一步坚定改革开放的基本国策,义无反顾地拥抱全球化,主动与国际接轨,加入国际竞争的一年。因此,1992年对于本报告研究来说具有双重意义:一是后冷战时期的开启,二是中国加入全球化浪潮的起始。

选择2010年作为研究时段的节点,是因为通过近20年的发展,中国社会在政治开放、经济发展和文化繁荣等各个方面都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绩,出现了中国近代史上从未有过的盛世时期。尽管还存在不少争议,但中国作为一个大国已经和平崛起。在21世纪十年中,中国每年都在承受国际舆情的考验。这种考验在2008年达到了高潮。但2010年中国上海成功举办了世博会。上海世博会在一定程度上是改革开放近30年来,中国向全世界集中展示在政治、经济和文化等各方面取得成绩,这也预示着中国社会整体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18]

鉴于此,本报告认为选择1992年-2010年作为研究涉华国际舆情并讨论中国的对外宣传战略具有合理性,能较全面反映这个时代的特征和全貌。

2、关于国际媒体的选择

本报告选择了美国《纽约时报》、德国《时代》周报以及法国《世界报》三份报纸作为国际舆情研究对象,从中抽取上述研究时段内其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作为分析样本。本报告认为这三份报纸可以较好地反映涉华国际舆情的现状,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对中国的国际舆情环境。

作为一份在世界范围内有影响力的报纸,《纽约时报》的国际新闻报道不仅为其它新闻媒体设置了议程,还可影响国际性事件的走向。^[19]进入21世纪以后,中国和美国作为国际政治版图上两股重要力量,其联系越来越紧密,但也有纷争和摩擦。把握好两国的舆情走向,对于相互之间加强合作消除误解来说就显得非常重要。执美国舆情之耳的《纽约时报》恰好处在这一微妙的位置,进而成为观察美国对华舆情变化的重要风向标。

《纽约时报》创刊于1851年,1896年起由阿道夫·奥茨家族经营,至今已有百余年历史,是美国历史最悠久、流程最完备的日报,也是美国最有影响的高级报纸,素以消息灵通、言论权威著称。它拥有的1100位记者遍布世界各地。《纽约时报》倡导的中高层文化与消费归属感是报纸的核心所在,这使得它在强调多元化与政治正确的时代成为保守重镇,也奠定了它在突发新闻、国际局势与政治报道方面不可撼动的声音。在美国的精英媒介中,《纽约时报》具有神话般的声望,号称是“政治精英的内部刊物”,美国国务院、国会、各国大使馆和社会社团都依赖它来建立普遍性的参考框架。因此《纽约时报》被西方誉为“权力机构的圣经”和“档案记录报”。有人甚至说,《纽约时报》没有报道的新闻不算新闻。^[20]而在政治议题已经失去中心位置的20世纪80年代以后,《纽约时报》领袖庞奇把它变成一份在各个领域都表现杰出的报纸。它网罗了全美最杰出的新闻人才,除了努力在新闻报道的各个领域继续保持它一贯的严肃性和权威性以外,对《纽约时报》进行改版并且加大投资,开始对体育新闻、大都会新闻版面进行扩充,增加时尚版,以期在新世纪多媒体共存的状况下谋得更大的发展空间。虽然2003年布莱尔新闻捏造的事件给报纸带来了一定负面影响,但其历史声望并未受到质疑。现在该报每天平均100版,要闻版24版,其它为各个专题版。主要版面彩色印刷,星期日版版数是平日的一倍。^[21]

《纽约时报》对中国的关注最早可以追溯到办报初期。晚清时期随着美国势力在中国的渗透,《纽约时报》就将报道的触角伸向中国,最早的有记录的报道是1854年4月20日一篇题为

《1854年的上海：自由港》的报道。^[22]此后，中国近现代史上发生的重要事件中都有《纽约时报》的身影。如清朝的终结、中华民国的建立、“九一八”事变、南京大屠杀、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三年自然灾害、文革、十一届三中全会等。同时，《纽约时报》对中国普通人的生活和社会变迁也予以关注。如1871年一篇介绍广州普通人一天生活和社会风情的《广州一天》和另一篇介绍四书五经对清朝社会思维影响的《四书五经维系清朝灵魂》。^[23]董鼎山等老报人回忆：在50年代至70年代20余年间，中美虽无邦交，但专家们仍认为《纽约时报》对中国报道在尽可能范围内还是很详尽的。^[24]

德国《时代》周报是德国一份具有影响力的报纸，于1946年2月21日创立。1996年起，该报隶属于Georg von Holtzbrinck出版集团。每周四出版，每逢节日时该报一般会提前出版。《时代周报》诞生在汉堡，其目标读者群为受过良好教育者，传统上主要为学者和知识分子，包括德国政界、经济界和知识界的精英人士，成为他们了解德国和世界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件的重要媒介，影响他们的观点形成。该报政治上偏向自由派。在争议性的话题上该报也给予不同立场者发表言论的空间。根据德国权威民调机构阿伦斯巴赫提供的数据，该报拥有超过200万的读者，成为德国首屈一指的“公民报纸”。近5年来，中国的政治和经济话题构成了德国《时代》周报特别关注的领域，因此研究德国《时代》周报的涉华报道有助于了解德国对中国的总体舆情环境。

法国的《世界报》是法国在海外销售量最大的日报，是法国唯一独立自主编辑发行的主要报纸，在法语国家地区颇有影响，国际知名度较高。主要读者是法国和法语国家地区的政、经、知识界及专业人士。该报创刊于1944年10月，由伯尔·伯夫-梅里等30多位年轻记者共同创办，该报第一篇社论宣布了他们的新闻理想：“本报的第一个宏愿就是保证读者得到明确、真实和尽可能迅速、完整的新闻。”伯夫-梅里还为报纸定了四大原则：国际视野、保持质量、维护独立、信守承诺。其中，“维护独立”是核心。该报内容全面，信息量大，报道严肃，深层报道和评论、政要专访比较多，措辞讲究。其国际时评言简意赅，有较强的权威性和参考价值，颇受各方关注。法国总统、总理、外长常在该报发表独家谈话，外国元首和政经界人物也常接受该报记者采访。该报政治倾向“中左”，在国际问题上反映法政府立场。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本报告认为选择上述美国、德国和法国三家报纸涉华国际新闻报道作为研究涉华国际舆情的文本可以基本反映目前中国涉华国际舆情的现状和国际舆情环境。

二、研究设计

国际舆情作为概念比较好理解，人们也能较好地感知它作为一种现实场域的存在。但要作为学术性概念开展论述，国际舆情作为一个概念有时相对宽泛。因此，本报告对涉华国际舆情的研究主要是基于上述三家国际性媒体的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的内容分析研究为主，包括文本内容分析和文本框架分析。

本报告认为通过对中国国际新闻报道的文本内容分析可以了解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的具体报道特征和总体态势；而通过文本框架分析则可以探讨涉华国际新闻报道中的框架，并可以此来讨论其与社会环境的互动关系。

1、分析指标

本报告对涉华国际舆情的分析主要确定了五大指标。为了对每一个分析指标开展全面论述，在讨论每一个分析指标时也会开展相关的交叉指标分析，使国际舆情的研究相对立体化。这五大指标分别为：国际舆情规模和来源、国际舆情关注度、国际舆情建构者、国际舆情框架和国际舆情态度。

(1) 国际舆情规模和来源。主要包括了国际新闻报道数量和消息源两个分指标。报道数量主要是三家报纸在19年期间涉华新闻报道的段落总数量分布；消息源主要是国际新闻报道中包含的消息来源，主要分为中国境内的中国消息源、中国境外的中国消息源、中国境内的外国消息源以及中国境外的外国消息源和未知消息源（不明确和模糊消息源）和无关消息源（其他不相关）等类别。

(2) 国际舆情关注度。主要是对国际新闻报道涉及内容和主题(如政治、经济、人权、军事等)及其侧重点的分析,包括外交活动、政治活动、地方政府、民主人权、经贸金融、军事国防安全、教育、文化艺术、体育娱乐、科学技术、法律犯罪、健康医疗、宗教、民族问题、环境、人口、交通旅游、人情世故、灾难、社会问题、台湾问题、土地住房建设等。

(3) 国际舆情参与者。主要分析国际新闻报道中报道对象,考察什么样的人、团体或是机构以何种方式加入到舆情建构过程中来,人员主要包括外国人、中国人(泛指)、知识分子学生、政府官员、中国国家领导、商业人士、不同意见人士和政治犯、娱乐和体育人士、工人、农民工、罪犯、媒体人士、中共党员、华侨人士、警察、军方人士、其他人士(除上述外);机构主要包括中央部委部门、在华有商业活动的外国商业机构、中国境内的商业机构、中国境外的商业机构省、市级职能部门、媒体机构、国际组织(联合国)、在华无商业活动的外国商业机构、部队和国防机构、非政府组织、兴趣爱好族群、其他外国机构和不适用等类别。

(4) 国际舆情框架。将分为冲突和非冲突框架两大类,冲突性的框架是指在新闻报道中展示了有争议的元素和成分,尤其是中西方的不同认知模式,而非冲突框架则指没有冲突性元素的文本。本报告还将开展与其他指标的交叉分析。

(5) 国际舆情态度。主要分为正面、中性和负面三个分类倾向性,分布代表正面态度、负面态度、中性态度,并以此来确定国际舆情的总体倾向性态度。如果没有关联性,则表示不相关。“正面新闻”、“负面新闻”和“中性新闻”之区分主要看一则国际新闻所用的(或内容)是否有利于或有损于被报道对象的利益和总体形象。如果一则国际新闻对被报道对象的用词是正面、积极的,如“大力推进”、“积极有效”,那么这条国际新闻就可以归入“正面新闻”。如果一则国际新闻的用词(或内容)有损于报道对象的利益和形象,使用像“大肆宣扬”、“苦不堪言”等词语,那么这则国际新闻就被归入“负面新闻”。如果从一则国际新闻的用词或内容无法判断是“正面”还是“负面”,那么这则国际新闻就可以列入“中性新闻”。有时,一条国际新闻所报道的内容可能会引起争论,但如报道所使用的语调相对比较平和,这样的国际新闻也会被列入“中性新闻”。^[25]

2、抽样分析

本报告使用的数据库是LexisNexis 电子数据库。^[26]抽取新闻的关键词是“中国”和“中国人”。出于研究可行性的考虑,本研究抽样借用了美国社会心理学网络(Social Psychology Network)提供的一个开源网站,^[27]可以用来随机抽样并形成抽样的“建构星期”的方法。

在1992年至2010年这19年内,本报告以随机抽取日期的方式建构了19个“建构星期”,每一个星期代表了一年。最终按照日期抽取了这19个星期的美、德、法三大报纸关于中国的相关新闻报道。^[28]

本次研究的文本只保留新闻报道,包括消息、新闻、新闻特写和特写等不同文体的新闻报道,但是剔除了社论。另外,所保留的国际新闻报道都是关于中国的报道,舍去了只略提及中国的新闻报道。为了使研究更细致客观,本报告的量化研究单位舍弃了传统上以每篇新闻报道为研究单位的做法,而是以新闻报道的自然段为单位。这样,三国报纸共抽取了366篇国际新闻报道,4299个自然段,其中,《纽约时报》259篇,3505段,《世界报》83篇,493段,《时代报》24篇,301段。

为了确保文本分析数据的有效性,本报告邀请了两批懂英语、法语和德国的编码人员,他们均来自上海外国语大学的英语、法语和德国的研究生。第一批编码人员在完成所有国际新闻报道抽样和归类的基础上,第二批编码人员进行了二次抽样归类分析,发现按上述同样的分类和分析五大类指标的两次抽样分析误差在8%至12%之间,也就是说两次文本分析各个指标的重合度都在88%至92%之间,超过了目前学界一般认同的85%的最低互判可信度。因此,本次文本分析所获得的数据是有效和可信的,具有一定的代表性。

3、研究问题

通过对上述五大指标的分析，本报告试图探析以下三方面问题：

- (1) 上述三家西方报纸在19年研究时间段内的国际舆情规模有多大涉及到哪些消息源？
- (2) 涉华国际舆情主要关注了哪些主题？到底关注了哪些参与者？
- (3) 涉华国际舆情框架是如何建构的？三大西方报纸对中国呈现了什么样的倾向性态度？

第三章 数据分析

一、国际舆情规模和来源

1、国际舆情规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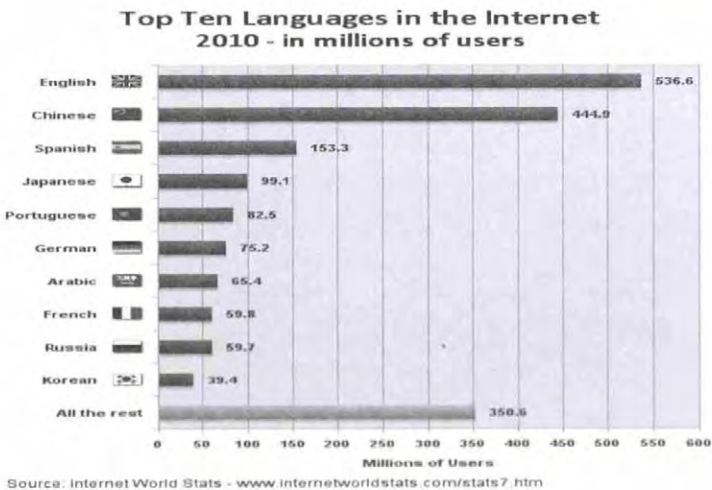
国际舆情的总体规模与其新闻报道的数量是呈正比的关系，也就是说新闻报道的总体数量越多，国际舆情的总体规模也就越大。这种趋势在下表得到验证。

从右表可以看出两大趋势：一是代表英语国家的《纽约时报》在1992年到2010年的19年中对华的新闻报道数量总体上超过了法国《世界报》和德国《时代》周报。二是尽管法国的《世界报》和德国《时代》周报在涉华报道总量上相对较少，但可以看出从2006年以后他们对中国的新闻报道量在不断增加。需要指出的是，德国《时代》周报作为周报在数量上可能少于法国《世界报》，但在最近五年中的增长速度较快。

尽管这次只选择了《纽约时报》一家报纸，但应该承认英语国家对中国的总体关注度（即国际舆情规模）是高于其他语种国家对中国的关注的。

这可能与英语国家的总体强势有关联，而且这种趋势在互联网上的语种使用状况是相一致的，从下表可以看出，到2010年全球在互联网上的使用语言主要是英语和中文，远超出了德语和

三家报纸的涉华新闻数量（段落）分布表				
年份	《纽约时报》 （美国）	《世界报》 （法国）	《时代》周报 （德国）	小计
1992	131	12	0	143
1993	140	7	0	147
1994	54	29	8	91
1995	74	31	0	105
1996	115	19	0	134
1997	185	9	0	194
1998	191	8	2	201
1999	317	81	14	412
2000	125	1	41	167
2001	160	11	44	215
2002	142	1	9	152
2003	220	91	0	311
2004	304	0	0	304
2005	218	25	0	243
2006	182	7	10	199
2007	211	27	44	282
2008	322	33	41	396
2009	170	30	36	236
2010	244	71	52	367
总数	3505	493	301	4299
百分比	81.53	11.47	7.00	100.00



法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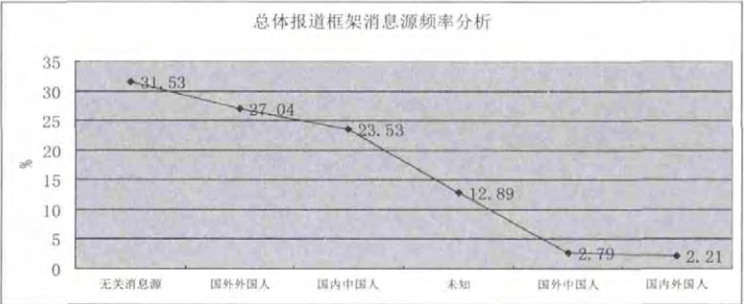
就所选择的三种语言的报纸而言，可以这样预测：英语报纸在涉华国际舆情方面的总体规模在19年中呈现的趋势还将继续，在兼顾其他语种涉华国际舆情的同时，关注英语国际舆情仍将是一个重点。

2、国际舆情来源

国际舆情的来源主要是媒体新闻报道的消息源。作为新闻报道分析指标，消息源好比新闻报道的生命线，其提供的消息赋予了新闻生命。对于新闻中的消息源的分析可

以在一定程度上看出新闻的立场。比如在国际报道中，消息源国籍的不同，其提供消息的立场自然会有不同。另外，还有匿名消息源，或者没有明确消息源这种情况。这有可能是由于记者比较难以采访到当事人或有其他困难造成的。但是无论怎样，消息源不明确意味着消息可信度不高。西方新闻报道标榜其以真实客观为核心的新闻专业主义，众所周知，新闻并不都是由消息源的引用组成，而是记者自身叙述和消息源引用的一种平衡。

针对以上各种情况，本研究设置了六种消息源变量：国内中国人消息源，国外中国人消息源，国外外国人消息源，未知消息源（不明确的模糊消息源），其他（无关消息源）。研究重点是探索西方媒体如何表述中国及中国社会的。因此对于消息源的分析，实质上是考察西方媒体中谁在表述中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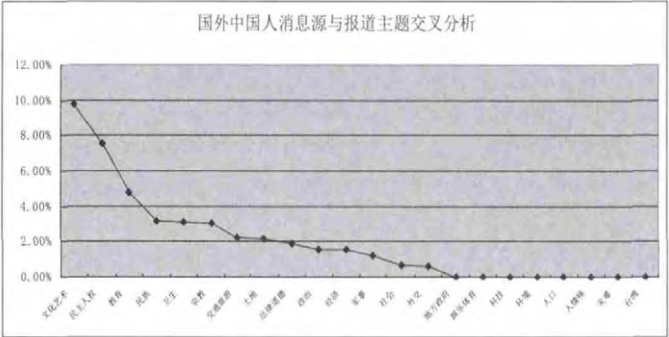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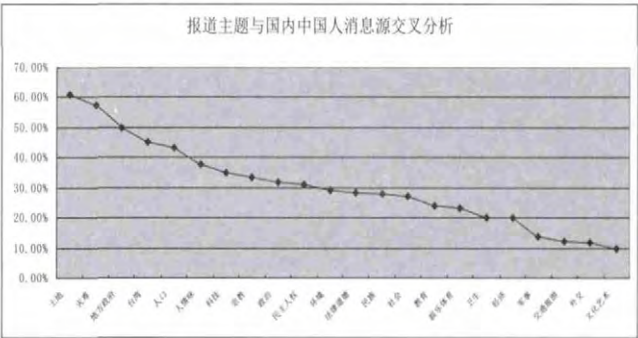
首先，上述三家报纸涉华新闻报道中消息源的总体分布频率：

可以看出，没有消息源的报道是频率最高的。排在第二位是国外外国人消息源，比例达27.04%，高出排在第三位的国内中国人消息源3.51%。可见，在三家报纸新闻报道中，国外外国人是引用最多的消息源。

而且如果将排在前两项和最后的国内外国人消息源（2.21%）相加，得出的比例超过60%。也就是说西方媒体对于中国人的报道更多是西方自身的独白。值得注意的是对于国外外国人和国外中国人的引用都高于对于国内中国人和国内外国人的引用，可见，虽然是关于中国的报道，但是更大比例的采访对象和引用消息源主要在国外。最后，值得注意的是未知消息源的比例为12.89%，可见，西方对中国和中国社会的报道中比较大比例引用不明确的模糊消息源。这种一般情况下并不专业的做法也传达出西方报道中国一种臆测的态度。

此外，需要注意消息源与报道主题的交叉数据。下图为国内中国人为消息源的报道主题分布表：

如图所示，在与国内中国人消息源的交叉中，土地排在首位，其次是灾难、地方政府、台湾、人口话题等。超过50%以国内中国人为消息源的报道主题只有三个，土地建筑问题、灾难和地方政府。其他所有的新闻主题超过一半的比例都不是以国内中国人为消息源的。也可以认为这三家报纸认为其他话题不适合以中国人作为消息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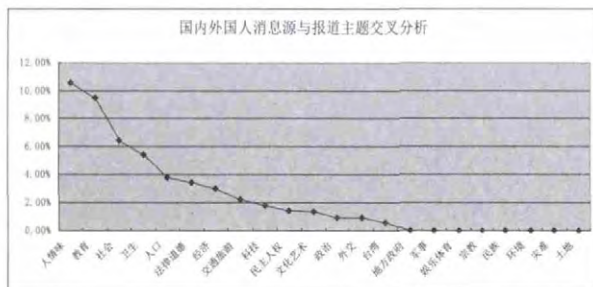


左图为国外中国人为消息源与报道主题的交叉数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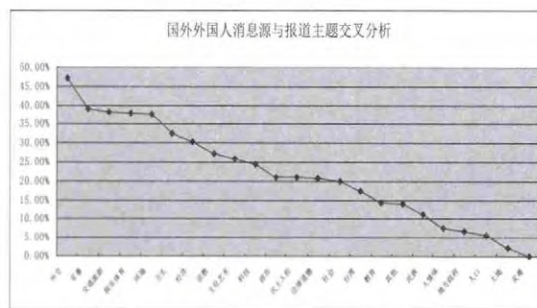
以国外中国人为消息源的报道主题中，文化艺术话题居首，接下来是民主人权、教育、民族、卫生、宗教等。而地方政府、娱乐体育、科技、环境、人口、人情味、灾难、台湾等主题变量没有涉及国外中国人消息源。这说明三家

报纸在报道中国的不同话题时有选择性和偏好。这一点也适合其他消息源的分析。

下图在以国内外国人为消息源的新闻报道中，人情味类排在第一位。其次为教育、社会、卫生、人口等。地方政府、军事、体育娱乐、宗教、民族、环境、灾难、土地等话题没有引用任何国内外国人消息源报道。这从一个角度说明在华外国人谈论的中国话题主要是软性内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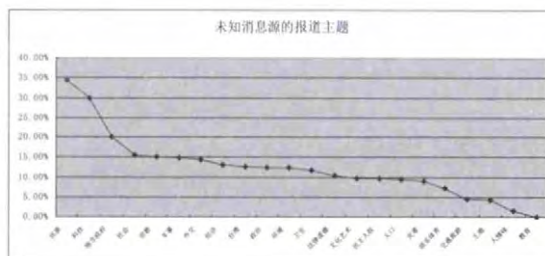


从下图中可以看出，以国外外国人为消息源的新闻报道中，外交主题排在第一位，高达47.1%。其后是军事主题、交通旅游、娱乐体育、环境、卫生、经济等。国外消息源对于各种主题都有报道，只有灾难比例为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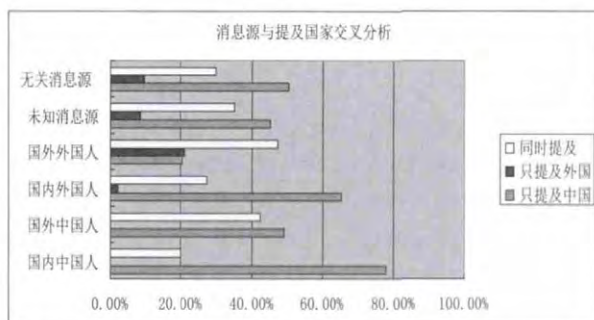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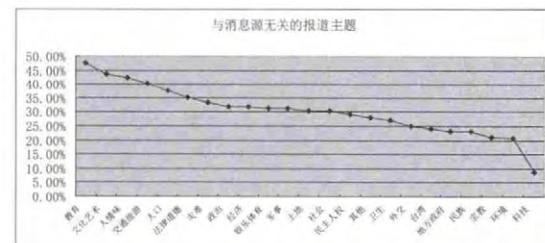


未知消息源意味着消息源不明确，不明确的消息源有可信度不高的嫌疑。在与未知消息源的交叉中，民族问题主题居于第一位，34.4%的民族主题的报道的消息源都是未知的，即不明确的。另外感知非常负面的对于科技主题的报道也有30%是没有明确的消息源的，也就是说类似于空穴来风。其他比较高的有地方政府事务、社会主题、宗教、军事、外交等。

右图在没有引用消息源的报道中，排在前五的主题分别为教育、文化艺术、人情味、交通旅游和人口。其中感知百分百为中性的教育主题的比例最高，达47.62%。其中排在最后面的是科技，不到10%的科技报道是没有引用消息源的。反过来说，也就是科技报道的消息源引用率是最高的，超过90%。



此外，本报告还分析了国际舆情消息源与提及国家（只提中国、只提外国或同时提及）之间的交叉数据。从下表可以看出：身在国外的中国人消息源，他们只提及中国的比例很高，而几乎不提及外国或其他国际组织，有趣的是在中国的外国人消息源也表现出了同样的趋势，尽管他们同时提及中国和外国比例要高一点。但在中国之外的外国消息源，则对中国和外



国均会同时提及，显示出较为平衡的趋势。而在未知消息源和无关消息源两类中，总体趋势相同，没有表现出明晰差异，尽管他们倾向多提及中国，同时提及中国和外国或只提及外国的比例相对低一点。

这说明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国外，中国人消息源更多关注还是中国，而较少提及外国，其所在的地理环境（不管是在国内还是

国外)对其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而外国人消息源中,他们所处环境则对他们是否提及中国和外国有一定影响,这从一个层面说明了中国环境的特殊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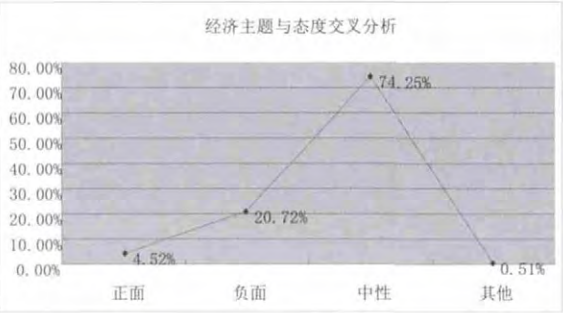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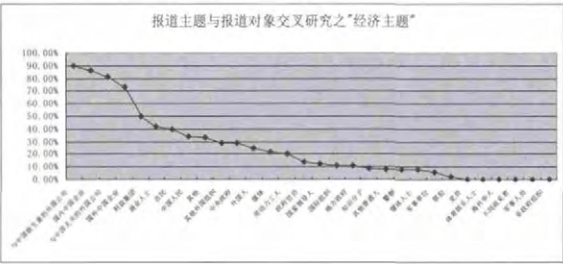
另外,本报告还发现在上述不同类别的消息源中提及美国的比例都很高,在50%到60%之间,其次为欧洲、法国和德国、日本和国际组织以及俄罗斯和英国,但分布没有表现出明显的特征。这说明美国作为世界上第一号强国的影响力:不管中国人还是外国人消息源,不管他们身处何地,美国对他们的影响力还是最为强大的,使他们经常会提及。

二、国际舆情关注度

国际舆情的关注度主要是分析三家报纸在19年中涉华国际新闻报道的主题和内容。从右表可见,排在前五位的分别是经贸金融、文化艺术、外交活动、政治活动和民主人权。排在最后五位分别是土地住房建设、宗教、灾难、地方政府和教育。

排在第一位的经贸金融话题非常值得注意,占总量的27.3%,比排在第二位的文化艺术主题10.5%高出近两倍,遥遥领先于外交、政治和民主人权主题。这基本上反映了中国过去20年中经济发展的主旋律。虽然在冷战时期,中国的形象是共产主义中国,民主人权可说是西方对于中国的一大关注点。但三家报纸对民主人权主题的报道总量只占6.4%,远远落后于经济报道。可见,冷战后西方报纸的中国报道充分体现了全球化的时代特征,对于中国的关注度仍以经济主题为先。这从一定程度上说明在全球化时代下西方报纸中的中国首先是经济中国,而不是以前的意识形态中国,或者说单纯的意识形态

三家报纸的关注度分布				
内容分布	《纽约时报》 (美国)	《世界报》 (法国)	《时代》周报 (德国)	小计
经贸金融	960	162	52	1,174
文化艺术	349	21	81	451
外交活动	259	67	9	335
政治活动	265	22	35	322
民主人权	246	26	5	277
法律犯罪	245	4	15	264
台湾问题	165	11	6	182
军事国防安全	134	34	1	169
社会问题	111	11	33	155
健康医疗	120	5	4	129
民族问题	73	52	0	125
体育娱乐	117	3	4	124
环境	44	16	46	106
交通旅游	86	2	1	89
人情世故	66	0	0	66
科学技术	38	19	0	57
人口	52	1	0	53
土地住房建设	45	1	0	46
宗教	26	7	0	33
灾难	31	2	0	33
地方政府	26	4	0	30
教育	17	0	4	21
不相关	30	23	5	58
报道总数	3,505	493	301	4,299



中国。为了对三家报纸对中国前五位关注度有更加深入的了解,本报告对前五位的话题做了更为细化的交叉分析,以对国际舆情的关注度作更为全面的论述。

1、经济关注度。

左表显示,在经济主题中,报道对象以常见的经济单位——公司企业为主。排在前四位的分别是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国内中国企业、与中国无关的外国公司和国外中国企业。这一排名也体现了新闻价值规律中“接近性”原则。外媒最关注的报道对象是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

当然,在全球化大潮中,中国企业也受到很

大的关注。另外，在前十位报道对象中，有三个变量是人物变量，他们分别是商业人士、农民或农民工这一群体和作为一个整体的中国人群体。这里耐人寻味是40%的农民对象报道出现在经济主题当中，比中国人（33.8%）还高出7个百分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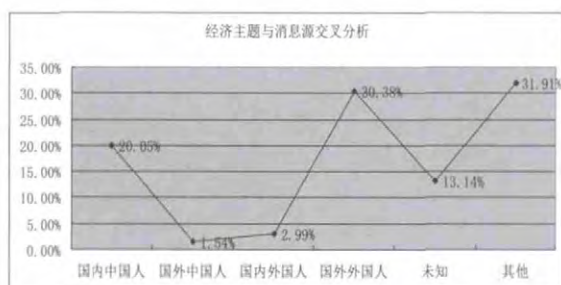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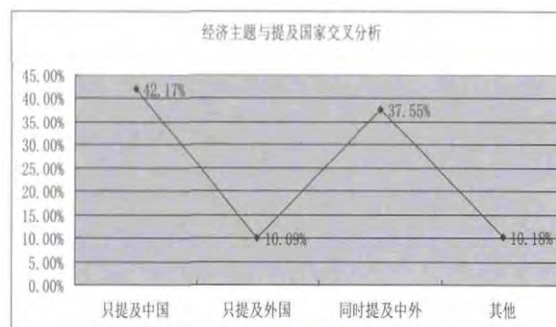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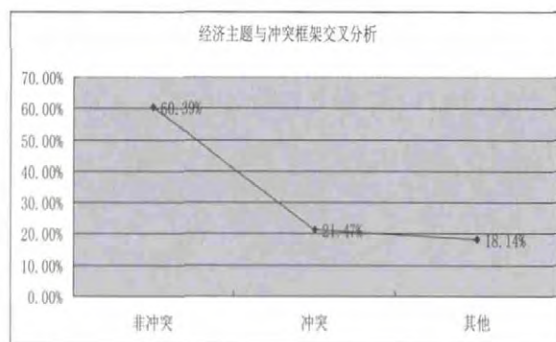
值得注意的是像党员、体育娱乐人士、海外华人、持不同政见者、军事人员和非政府组织这六类对象没有出现在经济主题中。

如上表所示，在报道经济主题时，西方三国报纸的总体态度相对客观中性，其中超过70%的报道持中性态度，还有4.52%的正面态度，尽管负面态度的新闻报道也有一定比例（超过20%）。

三家西方报纸的态度决定其报道框架，主要指他们在报道中国经济话题时是否把中国描绘成某种威胁或者其他冲突性质的因素。从下图可以看出，三家报纸对中国的经济主题基本采用了非冲突性框架，比例超过了60%，与其中性态度的比例接近。而他们采用冲突框架的新闻报道比例（21%）也与他们的态度倾向性比较一致，可见三家报纸的经济主题报道相对比较客观。

当然，在全球化时代，任何国家媒体的新闻报道都不是孤立的。随着时空压缩和边界的消失，三家报纸的中国经济新闻报道也被置于国际语境之中。本报告通过交叉分析发现（下表）：在报道经济主题时，三家报纸已远远不是单纯对中国国内经济形势的报道，在提及中国的同时，也会提及其他国家和机构。虽然只提及中国的比例仍为最高（42%），但同时提及中国和外国比例仅仅比只提及中国的比例低5个百分点，此外也有两个10%只提到外国或者其他地区和国际组织。而他们提及的最多还是美国（60%）、日本（8%）和欧洲8%以及德国（7%）和法国（3%）。可见，中美经济关系还是举足轻重，特别受到西方媒体的关注，还有就是欧洲和亚洲，特别是中国与其邻国的关系。这些比例在一定程度上呈现了本报告分析的西方三家报纸的中国经济关系图景，指明了中国经济的主要全球关联者。中国经济话题早已跨出国界，与世界主要经济国家息息相关。

那么这个经济图景主要由谁来表述的呢？从经济主题与消息源的交叉分析中发现（见下图）：其他（即没有消息源）这一比例最高（31%），也就是说对于经济主题主要是记者的解读，并没有使用消息源。然后才是国外外国人（30%）和国内中国人（20%）作为消息源。也就是说中国的经济图景主要还是由记者本身和国外外国人作为消息源来塑造或解读的（共61%）。国内中国人作为消息源的解读只有20%。这也可以解释为什么上述中国经济话题呈西方化的倾向。



2、文化艺术关注度

在文化艺术关注度方面，三家西方报纸在新闻报道中最为关注的是知识分子群体，包括学生、专家和艺术家等，遥遥领先于体育娱乐人士、商业人士、国家领导人和其他普通人。而劳动工人、军事人员、警察、中央政府、军事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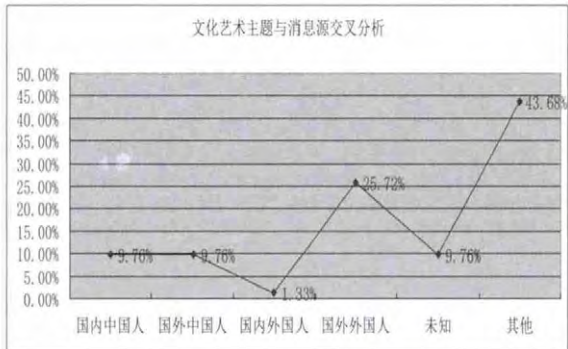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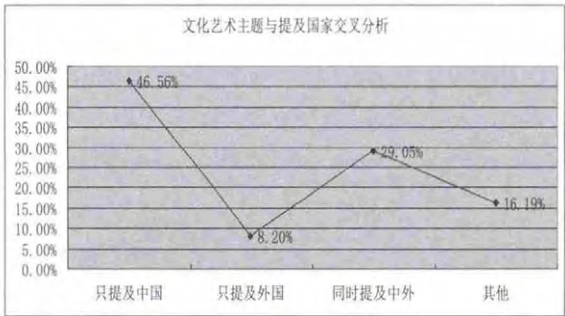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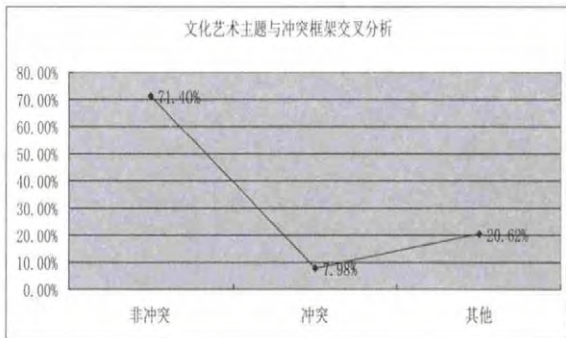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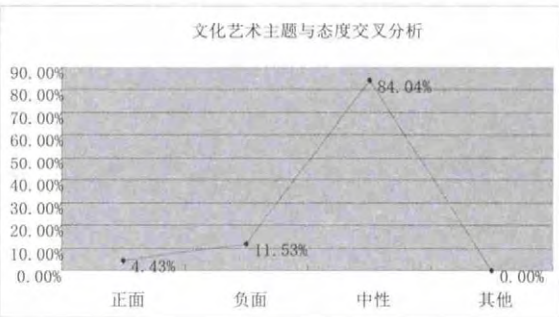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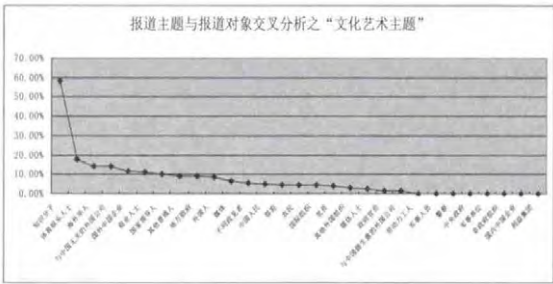
位、非政府组织、国内中国企业和利益集团这几类对象没有在文化艺术主题中出现。

右图显示，西方媒体在报道文化艺术主题时，总体上也是以中性态度为主，比例高达80%以上，而负面态度（11%）和正面态度（4%）的比例较低，尽管负面态度的比例是正面态度的两倍。这说明西方媒体在报道涉华文化艺术主题的态度较为客观中立。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在报道文化艺术主题时所应用的框架也是以非冲突框架为主（71%），应用冲突框架的比例不到8%。结合上述交叉分析，可以看出西方三国报纸在报道文化艺术主题时是客观中性和非冲突性的。

三家西方媒体在报道涉华文化艺术主题时是否将中国置于国际语境之中呢？如下表所示，他们在报道中国时会提及其他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但情况与上述经济关注度截然不同，“只提及中国”这一比例（46%）高于其他指标，这说明西方三国报纸在报道文化艺术主题时，更多是在中国国内语境中报道。当然也会开展与外国的比较，因为“同时提及中外”这一比例也高达30%。这说明中国与国际上在文化艺术上的交流同样受到西方三国报纸的关注。

在报道文化艺术主题时，三家报纸提及了41个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但主要还是关注中国和美国以及欧洲为主，显示出了较高的相关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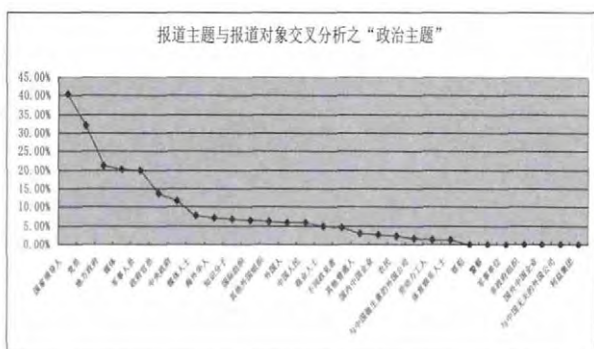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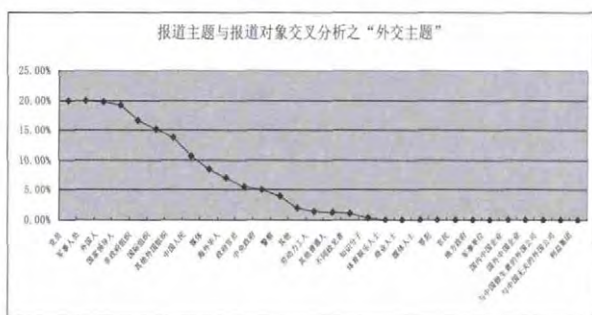
性。

但左表消息源交叉分析显示，西方媒体在表述文化艺术类主题时突出的还是记者自身的解读，该比例（其他）接近一半（43%）。此外，中外中国人作为消息源的比例也相对较低，两者相加也没有超过20%，低于国外外国人25%的比例。由此可见，文化艺术关注度中，中国人的声音还是比较小的，中国文化图景的解读和表述主要是记者本身和国外的消息源。

3、外交和政治关注度

在主题排名中，政治和外交排在第三和第四位。鉴于这两类主题的相似性，本报告把政治和外交合在一起进行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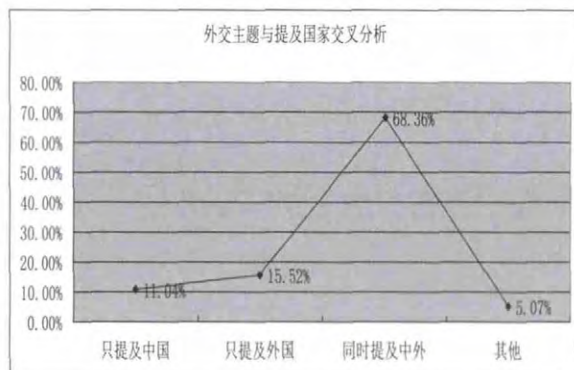
下表显示，在三家西方报纸报道外交主题过程中，最为相关的前五位报道对象分别为党员、军事人员、外国人、国家领导人和非政府组织，尤其是党员和军事人员这两个指标均为20%。从



较高，高出外交17个百分点。可见在报道政治主题时，西方三国报纸的态度倾向负面，而在报道同为政治活动的外交时，他们的态度较为中性。

与态度交叉分析类似，三家报纸在应用冲突框架方面，外交和政治主题的总体趋势类似。整体上说，三家报纸均以非冲突框架为主。但具体而言，在报道政治主题时，三家报纸应用了更多的冲突框架；同时无论在外交和政治主题，都有超过四分之一的新闻报道将中国视为某种威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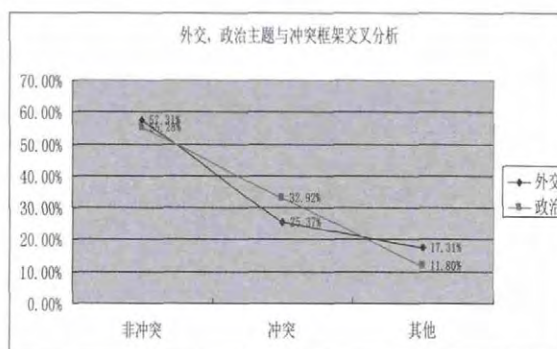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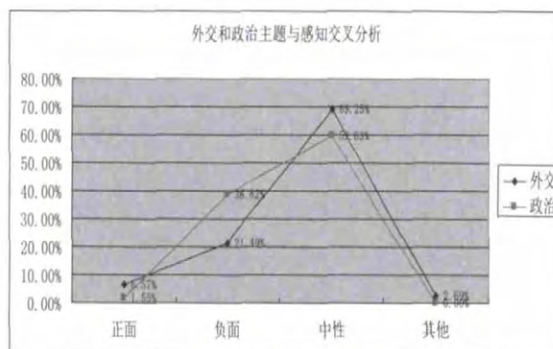
冷战后，中国的外交越来越多样化，丰富多彩。在西方三国报纸的报道中，外交主题有着怎样的国际关系背景呢？如下图所示，由于外交主题的特殊性，“同时提及中外”这一变量的比例高达68.36%，排在第二位的是“只提及外国”（15%），比“只提及中国”（11%）高4个百分



机构层面，非政府组织比例最高，其次是国际组织和其他外国组织，均高于中国中央政府。从总体上看，在外交主题中出现的报道对象以政治人物或政治组织为主。可见，三家报纸以外交为主题的新闻报道更偏向于政治外交。

而在涉及政治主题时，三家报纸突出的报道对象主要是中国国家领导人，占40.4%，然后才是党员、地方政府、媒体和军事人员。与外交主题不同的是，商业人士、国内中国企业和与中国做生意的外国公司等经济类人物或单位也在政治主题中有所呈现。

西方媒体在报道外交和政治主题时所持态度又是怎样？下表是外交和政治主题与感知指标的交叉分析：外交和政治主题的总体趋势是一样的，都是以中性态度为主，也有少量的正面态度。具体而言，政治负面态度



点。那么在报道中国外交时，三国报纸关注的哪些具体国家呢？西方三国报纸报道外交主题时共提及45个不同的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其中排在前十位的国家为：

可以看出中美关系是最受三家报纸关注的，比例高达35%，其次是日本，15.42%。这说明

外交主题提及国家地区国际组织		
	次数	百分比
美国	149	35.90%
日本	64	15.42%
韩国	21	5.06%
北朝鲜	20	4.82%
俄罗斯	18	4.34%
印度	17	4.10%
德国	11	2.65%
联合国	11	2.65%
法国	9	2.17%
亚洲	9	2.17%

中日关系也是中国外交备受关注的重点。从第二位到第六位均是中国的邻国，然后才是德法两国和联合国。如果不考虑美、德、法三国报纸这一因素，可以看出中国作为一个大国以及与周边邻国的外交关系格外受到西方报纸的关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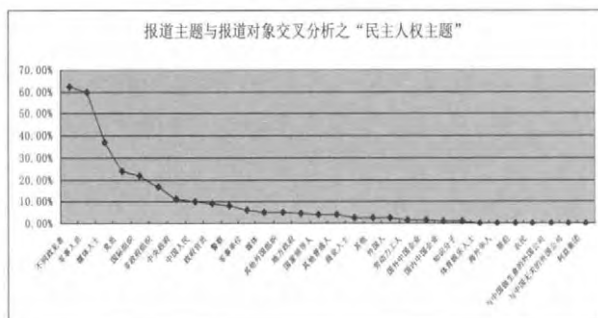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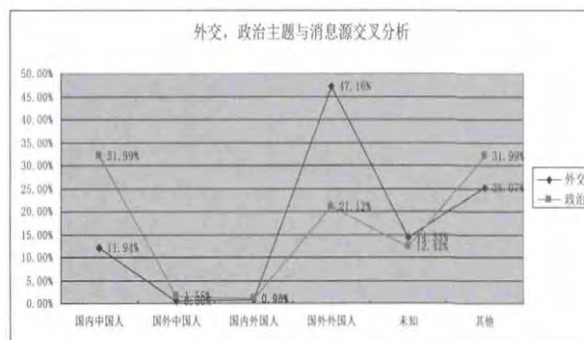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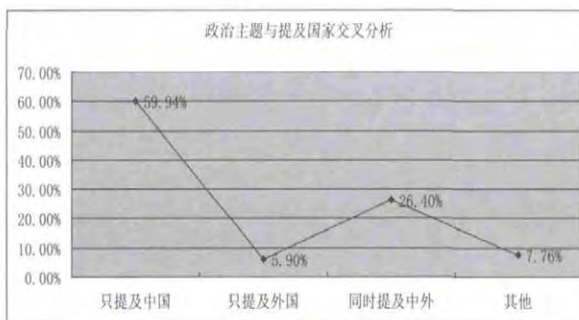
但政治主题的新闻报道则与外交主题颇为不同，三家报纸60%的新闻报道是纯粹关于中国的新闻报道。但也有26%的报道同时提及了中国和外国，这说明他们把中国置于整体国际关系语境之中了。本报告发现政治主题的报道中同时提及了27个不同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只是美国（59%）、日本（9%）、欧洲（7%）仍是最为关注的国家和地区。值得注意的是排在第四位的伊朗，说明西方三国报纸在报道政治主题时，有将中国和伊朗相提并论的倾向。

下表显示西方三报在报道涉华外交和政治主题时使用了大量国外外国人消息源，几乎占了近一半。但在报道政治主题时，国内中国人消息源比例比国外外国人高出10个百分点左右。

这与上面提及国家的交叉分析互相映照。外交主题多将中国置于国际关系语境之中，解读中国外交的消息源也是以国外外国人居多。而政治主题的报道更多的还是关于中国国内事务，所以国内中国人作为消息源（31%）多于国外外国人消息源（21%），不过其他消息源（即没有使用消息源或者说是记者的解读）这一比例也很高。这样看来，对于中国政治主题的解读，国内中国人消息源仍然居于少数，主流还是国外外国人和记者本身的解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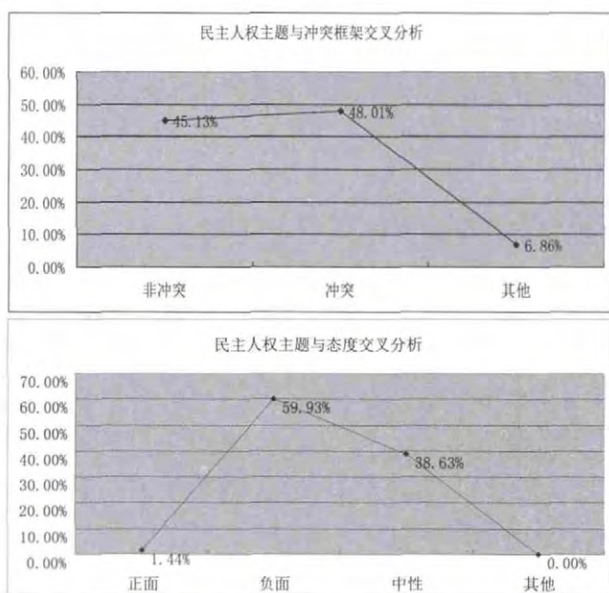
4、民主人权关注度。

报道主题频率分析排在第五位的是民主人权主题。“民主人权”虽然排在第五位，但是一直是西方报道中国的热门话题。以美国、德国和法国等国为代表的西方热衷于鼓吹西方式的民主人权价值观，一直不遗余力地推行以此为主要内容的所谓“普世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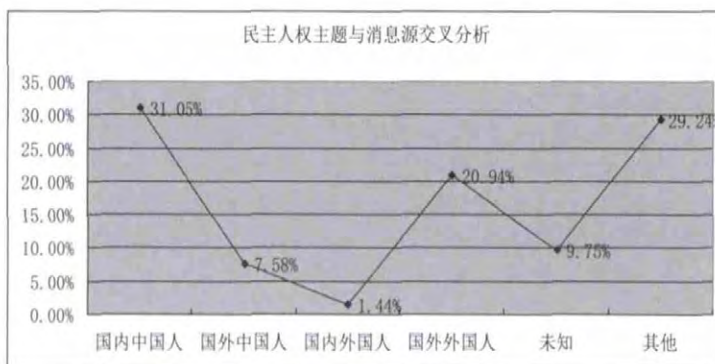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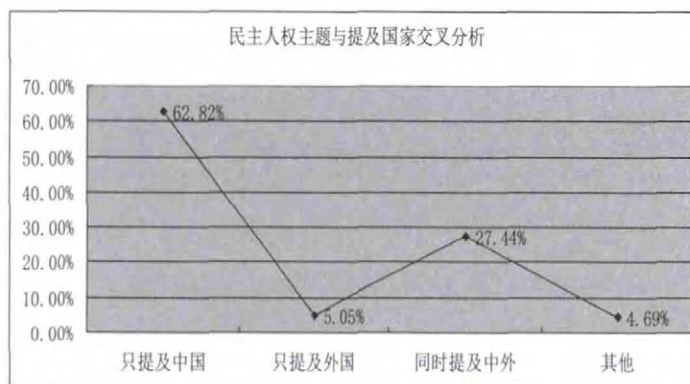
值”，可以说是历史上西方传教士情结的延续。因此有必要分析三国报纸对于民主人权主题的关注度。

民主人权主题与报道对象的交叉分析发现,排在第一位的是持不同政见者,达62.5%。可见西方民主人权的内容实质仍然没有脱离与政治挂钩的窠臼;其次是军事人员,达到60%的比例,然后是媒体人士、党员、国际组织、非政府组织、中央政府、中



报纸在报道民主人权主题时所持的负面态度自然也影响到了其冲突框架的应用，更多视中国为冲突元素或某种威胁。

此外，西方三国报纸在报道民主人权主题时有62%的比例只提及中国，只有27%的报道同时提及中国和其他国家、地区或国际组织。这说明三国报纸仅把民主人权问题作为中国国内问题来报道，没有更多置于国



家报纸的消息源构成仍以外国人和记者自身的解读为主，尽管国内中国人作为消息源比例增加了不少。

国人民（作为集体名词）、政府官员和警察。从这些对象排列中可以嗅出浓重的政治气味。

西方三国报纸在报道民主人权主题时所持的态度又是怎样的？左表是民主人权主题与态度的交叉分析。如下表所示，西方三国报纸对于涉华民主人权主题的报道近60%是持负面态度的，这与他们对上述的四大主题的态度截然不同。可见，西方媒体对于中国的民主人权问题仍是持批评态度的。

西方三家报纸对中国民主人权主题的负面态度也反映到了他们报道框架的应用。如上表所示，三家报纸在民主人权主题的报道过程中应用冲突框架的比例（48%）超过了非冲突框架的应用（45%）。也就是说西方三国

际语境下来考察中国的民主人权主题。

此外，本报告还发现西方三国报纸在民主人权主题的报道中，使用的最多的消息源是国内中国人消息源，达31%，以及其他消息源，达29%（多为记者解解读）。而外国人作为消息源的只有20%的国外外国人，以及10%的模糊消息源。可见，对于民主人权问题的报道，三

注释：

- [1] 李宗泽、王欢：《日本公布2010年GDP数据 被中国赶超退居世界第三》，《环球时报》，2011年02月14日。
- [2] 钱进：《涉华新闻报道的舆情研究——以〈纽约时报〉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年未出版硕士论文。
- [3] 郭可：《国际传播学导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95-96页。
- [4] 李希光：《妖魔化与媒体轰炸》，江苏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308-312页。

- [5] 都人：《看美国传媒如何“讲政治”》，2002年9月7日第6版。
- [6] 本报告中国际舆情和国际舆论是两个通用的概念，只是使用习惯的使然，没有内涵区别。
- [7] 李良荣：《新闻学概论》，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52-53页。
- [8] 康荫，雷跃捷：《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与新闻舆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5年8月版，第60页。
- [9] 李普曼著，林珊译：《舆情学》，华夏出版社，1989版，第241页。
- [10] Cohen, Bernard C.: *The Press and Foreign Policy*, Princeton, N.J., :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63, pp 233-234.
- [11] 郭可：《当代对外传播》，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145-146页，转引Makiko Nishitani. What is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 81.。
- [12] 胡钰：《新闻与舆情》，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2001年9月版，第118-121页，转自钱进：《涉华新闻报道的舆情研究——以纽约时报》为例》，上海外国语大学2007年未出版硕士论文。
- [13] Makiko Nishitani. *What is International Public Opinion*. p. 81.
- [14] 陈力丹：《舆情学——舆情导向研究》，中国广播电视出版社，1999年版，第26-27页。
- [15] 肖恩·麦克布赖德著：《多种声音 一个世界》，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1981年版，第273页。
- [16] 鉴于我国的国际环境的不断，涉华国际舆情的环境也在不断变化，因此本报告目前的研究设计与本报告申请时的研究设计稍有不同，主要目的是想更好地研究涉华国际舆情的发展规律。
- [17] 邓小平：对中国改革的两种评价，《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34页。
- [18] 本报告一直试图在一个较长的时间段内来考察涉华国际舆情的现状和发展规律，但总觉得国际舆情这一概念还是相对宽泛，一直想努力细化研究。本报告不认为目前的研究模块已经达到了细化研究的目标，但至少本报告做了努力且会继续做出努力。本报告一直认为对于基于国际媒体文本的国际舆情研究需要有专家进行理论提炼，也需要有计算机辅助进行国际新闻文本的采集和初步分析。
- [19] 易重华：《雅俗共赏的百年大报——纽约时报》，《学习月刊》，2006年 7期。
- [20] 易重华：《雅俗共赏的百年大报——纽约时报》，《学习月刊》，2006年 7期。
- [21] 刘继南、何辉等著：《镜像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6年3月，第2页。
- [22]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1854——1911》，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第3页。
- [23] 郑曦原编：《帝国的回忆——纽约时报晚清观察记 1854——1911》，第30，130页，当代中国出版社，2007年1月版。
- [24] 董鼎山：《读书》二十年合集，读书杂志社，2000年。
- [25] 有关内容分析的详细编码表详见附件一。因为为了便于沟通，本报告的编码表用英文形成。
- [26] LexisNexis是一个面向大学和学术研究机构的数据库，收录了新闻、法律、商业、医学等领域6100多种出版物，其新闻数据库是目前世界上收录媒体最多的数据库之一。Factiva是由道琼斯和路透社共同建立的信息数据库，提供159个国家和地区，以22种语言发行的10000多种权威信息来源，涵盖了30多种行业领域，该数据库以财经新闻见长。
- [27] 该网站的域名：<http://www.randomizer.org/>。基本操作方法比较简单：即按每年52周来计算，由网站随机在一年52周中抽取一个星期一、一个星期二、一个星期三、一个星期四、一个星期五、一个星期六和一个星期日，由此构成一个建构星期或建构周，并在上述19年中各抽取这样一个建构周的样本来代表一年，共19年的样本，然后这样抽取的建构周的样本进行较为详细的分析，一般分析的单位为一篇文章的段落。
- [28] Douglas A. Luke, Charlene A. Caburnay & Elisia L. Cohen, How Much is Enough? New Recommendations for Using Constructed Week Sampling in Newspaper Content Analysis of Health Stories. [J]. *Communication Method and Measures*, Volume 5, Issue 1, 2011, Pages, 76-91 另参见Yunya Song and Tsan Guo-Chang, Selecting Daily Newspapers for Content Analysis in China, a comparison of sampling method and sampling sizes. [J] *Journalism Studies*, 01 Sept, 2011, pages 1-14. 另参见, Hester, Joe Bob, Dougall, Elizabeth, the Efficiency of Constructed Week Sampling for Content Analysis of Online News. [J]. *Journalism and Mass Communication Quarterly*, December 1, 2007.

（上接第63页）

注释：

- [1] 陈晓燕.《邓广铸：正确看待数字营销市场》[J], 广告大观（综合版），2012.11
- [2] 王能东.《技术生存自反性与生存方式变革》[J], 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11: 90—95
- [3] [美]米切尔.《伊托邦:数字时代的城市生活》[M], 吴启迪等译, 上海: 上海科技教育出版社.2000.11
- [4] [德]海德格尔.《存在与时间》[M], 陈嘉映、王庆节译, 北京: 三联书店.1987.15
- [5] [德]伽达默尔.《科学时代的理性》[M], 薛华等译, 北京: 国际文化出版公司, 1988. 63
- [6] 胡建绩.《产业发展学》[M], 上海.上海财经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2008年.45-46
- [7]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5-16
- [8] [美]尼古拉·尼葛洛庞蒂.《数字化生存》[M], 胡泳、范海燕译, 海口:海南出版社1997.14
- [9] 唐超.基于网络的报业数字化战略研究[D], 学位论文, 北京: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2007.25—27
- [10] 蔡睿.《试论我国报业在互联网的地位及发展前景》[J],《记者摇篮》，2001.01: 14—17
- [11]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第 31 次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2013.01: 4